

第一回 为护法孙中山两度受挫 倡合作共产党西湖决策

公元 1922 年 6 月 16 日凌晨，寂静的广州夜空突然火光冲天，密集的枪炮声夹杂着“炮轰孙文！”“打倒孙大炮！”的叫喊。“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孙中山一手扶植起来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派兵包围总统府，炮击孙中山的住处观音山粤秀楼，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孙中山在枪林弹雨中仓促脱险，到停泊在白鹅潭的楚豫舰上避难。翌日，宋庆龄也化装来到黄埔与孙中山会合，两人转登吨位较大的永丰舰。孙中山在军舰上指挥海军和部分陆军反击陈炯明叛军，坚持 50 多天，终于未能挽回局势，于 8 月 9 日离开广东前往上海。在孙中山坎坷的革命征途上，这是他遭受的最为严重的一次失败。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他在就任中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 3 个月内，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 30 多件有利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商业发展的法

律、法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压迫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妥协退让，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孙中山虽辞去临时大总统，但毫不气馁，继续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而努力奋斗。他领导和参加了著名的二次革命、护国战争，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

1917年夏，当北洋军阀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废弃《临时约法》和‘旧国会’时，孙中山在上海毅然举起护法的旗帜，反对毁法横行的军阀独裁统治。7月，他与部分国会议员率领起义的海军第一舰队从上海去广州。8月25日，在广州召集非常国会。9月1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建立了与北洋政府相对立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表示要‘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尽之责，雪数岁无功之耻’。但由于他没有自己的军队，只能依靠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滇系军阀唐继尧。陆、唐之所以附和‘护法’，仅仅是为了利用孙中山的威望，来对抗段祺瑞，保护并扩展自己占据的地盘。他们勾结议员中的政学系政客，排斥孙中山，甚至不顾孙中山的坚决反对，擅自与直系军阀妥协，通电主和。次年4月，他们操纵非常国会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改大元帅首领制为七总裁合议制，把孙中山从大元帅降为7个‘政务总裁’之一，推老官僚岑春煊为主席总裁，置孙中山于无权的地位。孙中山怒斥南北军阀为‘一丘之貉’，并指出‘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然而对于这些军阀，却无力反击。5月4日，他愤而辞职，离粤赴沪，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

为了继续‘护法’，孙中山决定首先打垮桂系军阀，夺回广东。他把希望寄托在粤军首领陈炯明身上。陈炯明，清末秀才。

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曾参加过 1911 年的广州起义。1917 年，孙中山将广东前省长公署的 20 营警卫军交给陈炯明，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粤军。孙中山全力培植这支军队，在经费最困难的时候，甚至将自己在上海的房子拿去抵押，筹款以供粤军使用。1920 年 8 月孙中山利用各方反桂的形势命令在福建的粤军打回广东，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取得了胜利。广东军民欢迎孙中山回粤。11 月 28 日孙中山抵达广州重组军政府开始第二次护法运动。1921 年 4 月非常国会决定组织中华民国正式政府，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7 月他出兵平定广西统一了两广。12 月在广西桂林建立北伐大本营准备乘胜出师北伐进攻直系军阀以“完护法之愿”。但身兼陆军部长、内务部长、广东省长及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却与英帝国主义及直系军阀相勾结，反对北伐。先是暗中牵制，迫使孙中山于次年 4 月回师广东改在韶关设立大本营准备由广东直下江西南昌；接着，陈炯明又悍然发动了本文开头所叙述的武装叛乱，企图谋害从韶关前线回到广州的孙中山。

孙中山再次避走上海，为陈炯明的叛变深感痛心。他在《致国民党员书》中说他为民国奋斗达 30 年中间出生入死胜败之数不可屈指而“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历次失败都败于敌人，但这次则是“敌人已为吾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 10 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而不惜。此不但民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悲痛之余，他开始认识到过去利用一个军阀去打倒另一个军阀的旧办法是行不通了，但新的道路在哪里呢？子然无助的孙中山，迫切需要支持和帮助。

孙中山曾先后向日、美、英、法等国求援希望它们能同情

和援助中国革命。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在离粤去沪途中，曾绕道日本，希望能得到日本政府的援助，结果却发现“日本当局仍决心助段祺瑞）遽欲其改变方针事恐大难”，“只得匆匆归沪”。接着孙中山又致电美国总统威尔逊请求支持而威尔逊竟表示：“不愿与孙中山直接通信”将电文批交国务卿兰森处理，而兰森则根本怀疑孙中山“对中国目前将再有任何真正影响力”。1921年底华盛顿会议在美国召开尽管孙中山再三要求南方军政府派代表出席，却遭到美国政府的拒绝。孙中山所作的种种努力一一付诸东流。就在这时，苏维埃俄国和中国共产烦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使他开始了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列宁就热情洋溢地称颂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勇气概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认为他提出的“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十月革命胜利后亚、非、拉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系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体系，阐明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原则。据此，列宁十分关注中国革命，十月革命后不久即与孙中山建立了书信联系表示要互相支持“共同进行斗争”。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郑重宣布：废除沙俄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将沙俄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建议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并缔结友好条约。共产国际建立后，更不断派出代表同孙中山联系，一方面帮助孙中山同苏俄结盟，一方面帮助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合作。

在十月革命发生后，孙中山也一直关注着苏俄形势的发展。1918年7月，他致电列宁祝贺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收到贺电后十分高兴，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复函表示感谢。对于苏俄政府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孙中山曾经有过怀疑，但当苏俄政府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孙中山的疑虑便消除了。他将苏俄的十月革命与中国的辛亥革命作了比较，看到“满清鼎革 继有袁氏 洪宪堕废 乃生无数专制一方之小朝廷”，“政治不修 经济破产 瓦解土崩之势已兆”。他的目光开始转向苏俄，“以俄为师”逐步成为他的主要思想。1920年11月 他在上海会见了俄国共产党 布 远东局代表魏金斯基 要求与苏俄建立电台联系，并对把中国南方的斗争同苏俄的斗争结合起来抱有浓厚的兴趣。1921年8月 他在广州给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写了一封长信，热切地表示：“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同年12月，他又在桂林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作了三次长谈，讨论苏俄承认南方政权以及中苏结成联盟的可能性。马林向孙中山建议 改组国民党 联合社会各阶层 尤其是农工大众；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武装之基础；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合作。这次会见增强了共产国际、苏俄政府与孙中山间的相互了解，对于孙中山决定未来的方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国民党人说：“这便是总理联俄的起点了”。1922年4月底至6月中旬，孙中山进而在广州与少年共产国际兼苏俄政府代表达林进行多次会谈，具体研讨苏俄与孙中山的关系以及国共实现合作的前景，有关建立国共统一战线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

与此同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也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

导下，根据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的学说，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无产阶级不能单独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而必须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逐步形成和完善了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实行合作的政策。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提议邀请国民党等民主派及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反封建军阀的联合战线。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原则上确定了与国民党联合的方针。关于两党联合的具体形式，由于孙中山拒绝采用党外合作方式，马林提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并专程赴莫斯科请示共产国际执委会，获得了批准。共产国际授权马林来华指导中国共产党实行这一方针。共产国际的这一决定就密写在马林的衬衣上。

8月，正是孙中山第二次护法失败到达上海后不久，马林再次从苏俄来到上海。根据他的提议，中共中央在当月下旬举行杭州西湖特别会议，5名中央委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全部到会，马林、张太雷也出席了会议。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7月决定，并坚决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统一战线。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接受共产国际7月决定的决议，并决定中共少数负责人立即加入国民党。

西湖会议一结束，中国共产党立即着手进行两党合作的准备工作。8月23日，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会见孙中山，陈述“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孙中山听了非常兴奋，两人“畅谈不倦，几乎忘食”。孙中山对李大钊的

为人也极为赞赏，愿亲自介绍他加入国民党。李大钊说明他是第三国际党员 孙中山说：“这不打紧 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于是 由张继介绍 孙中山主盟，李大钊第一个以共产党员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两天后，马林也在上海会见孙中山，介绍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的决定，并建议以上海为基地开展群众性宣传活动。不久，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张太雷等先后加入国民党。

从这以后，孙中山决心依靠共产党人的“明确思想和无畏的勇气”改组国民党。9月4日他在上海召开改进国民党会议 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 53人参加了会议。孙中山即席解释了联俄联共政策，指定 9人组成“国民党改组案起草委员会”其中有共产党人陈独秀。为了推动国民党的革命化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向导》周刊等对孙中山、国民党的一些错误进行善意的批评和劝告。马林用笔名撰文批评说，孙中山经常联合一部分军阀去反对另一部分军阀，结果往往是‘昨天还是他的好朋友 今天能够翻脸 明天或成仇敌’。蔡和森也在文章中劝告孙中山应当一面与民众亲切结合，一面与苏俄结成“不二的同盟”；“大着胆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李大钊、张太雷等指出孙中山历来只偏重军事活动，忽视对民众的宣传和组织，这是辛亥革命以来 12年奋斗一无所成的主要原因。这些金玉良言，帮助孙中山总结了经验教训，使两党对于国民革命的基本认识逐步接近，奠定了合作的思想基础。在共同的斗争中，孙中山和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建立了真挚的革命友谊 宋庆龄回忆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 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

1923 年 1 月初，孙中山在上海连续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中国国民党总章》等重要文件 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重大转变。紧接着，他又毅然采取联俄的公开行动。1 月中旬，经李大钊、林伯渠联络介绍，孙中山在上海寓所与苏俄政府特使越飞进行会谈。李大钊、林伯渠也参加，接连谈了 6 天 进一步商讨了以俄为师 改组国民党与建军 以及苏俄援助中国革命等问题。孙中山“极为喜悦”曾吩咐侍卫无论何人都不予通传和不许登楼。26 日 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双方确认“当前中国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 与完全国家独立之获得”；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诚挚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托”等，从而宣告了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接着，为了避开帝国主义鹰犬的耳目，越飞以养病为名前往日本热海温泉，与孙中山的代表廖仲恺秘密进行了 1 个月的细节商谈。苏俄政府对孙中山的大力支持 坚定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决心。

正在这时 从广东传来了大好消息 陈炯明已被孙中山所组织的讨贼军（由许崇智的粤军、杨希闵的滇军、刘震寰的桂军等组成）所驱逐。2 月 孙中山第三次到广州建立政权 重新成立大元帅府，再任海陆军大元帅。从此，国共两党合作的筹划就从上海移到广州进行，广州成了真正的国民革命中心。

第二回开“一大”改组国民党 办“黄埔”建立革命军

在中国革命史上 1923 年的初夏 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国共两党以争分夺秒的革命精神加速了合作的步伐。

2 月，京汉铁路罢工工人流血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教育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使他们认识到：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同盟军，没有自己的武装，就无法在毫无民主权利的条件下战胜全副武装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从而大大增强了实现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迫切感。

6 月 12 日至 20 日 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三大”。会议批评了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关门主义倾向，张国焘等人认为共产党不应当与国民党合作，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革命，国民党是不能进行民主革命的，反对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加入国民党。经过热烈讨论，大会决议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改组国民党为民主革命联盟，“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的革命分子集中于

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这一决定表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前进了重要的一步。8月，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南京举行“二大”作出了相应的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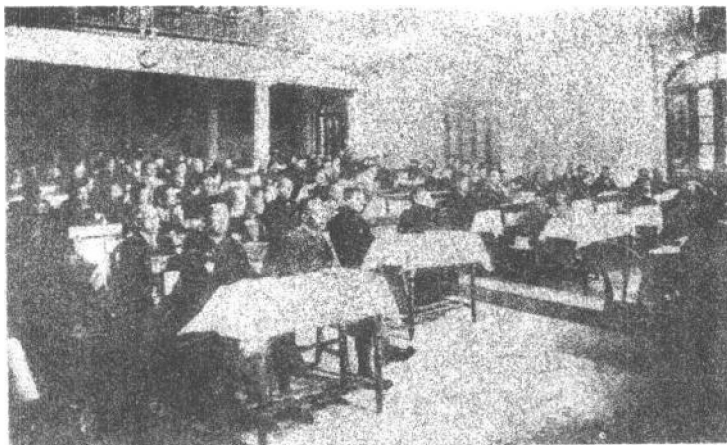
从这以后，在共产党各级组织的动员组织下，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加入国民党，在各省积极建立国民党组织，并“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用国民党的名义组织和参加各种人民团体。在北京，李大钊主持了国民党整个北方的领导工作，建立起北京、天津市党部和直隶省党部。在长沙，何叔衡、夏曦等积极筹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上海，毛泽东、王荷波、向警予等担任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重要工作。此外，浙江的宣中华、江苏的侯绍裘等也都参加筹建了国民党省党部，并在其中担任常务委员。远在巴黎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领导人周恩来，也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不久，成立国民党旅欧支部，80余名团员全部加入国民党，周恩来当选为总务主任，李富春为宣传主任。大批新鲜血液注入国民党，使国民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气勃勃的局面。

孙中山也同样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工作节奏。8月26日，孙中山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有共产党员张太雷等参加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从上海启程，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10月5日，直系军阀曹锟以5000元1张选票贿赂议员，以40万元巨款收买国会议员，当上了大总统，全国舆论哗然，大规模的反直运动迅速掀起。孙中山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在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的同时，更急切地将联合苏联和改组国民党摆上了议事日程。10月6日，应孙中山邀

请，苏联顾问团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来到广州。苏联政府代表加拉罕致信孙中山，说“鲍罗廷为我党元老同志之一，曾长久致力于俄国革命运动，请不仅视鲍同志为官方代表，也视他之为我的私人代表，你同他谈话就如同我谈话一样，他说的话，亦如同我亲口向你说不一样可靠”。孙中山读后十分高兴，立即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并在向国民党人宣布这一任命时说：“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鲍罗廷深得孙中山信任，他在按照苏联共产党（布）的经验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促使国共两党实行组织上的合作，鼓励国民党从事反帝斗争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0月19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戴季陶、张继 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25日在广州举行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胡汉民、谭平山、林森、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孙科、吴铁城 9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清 5人为候补执行委员，正式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并决定于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正当国共合作的筹备工作正着推进时，一股反对国民党前进的暗流翻卷起来。11月29日，右派邓泽如、林直勉等 11人在《国民党改组宣言》与《国民党章程草案》公布的同日，联名上书孙中山，指责这些文件“实多出自俄人鲍罗廷之指示”，“谭平山出面任事，陈独秀则在暗中牵线，内里隐其阴谋”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孙中山读信后批道：“此稿为我请鲍君所起，我加审定。原文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并断然表



中国国民党“一大”会场

示：“你们愿意跟着我革命的就来，不愿意革命的就走；我不能勉强拉你们来革命，你们也不能勉强拉我不革命。”当右派顽固地坚持不肯放弃自己的主张时，孙中山愤而指出：“你们不同共产党合作，我就解散国民党，加入共产党。”由于孙中山旗帜鲜明，在他的周围很快团聚起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一批左派，他们和共产党人并肩战斗，帮助孙中山完成了国民党改组的准备工作。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举行。这是国民党通过党内改组方式实行联共的大会。代表人数每省6人，其中3人由孙中山指定，另3人由各省党员推选。后来孙中山又临时加派了一些代表，所以有的省或特别区的代表人数超过6人。连同海外华侨的党员代表，孙中山特别指派的何香凝、陈璧君等3名女代表，以及列席的

中央执行委员 6 人 参加大会的总人数为 208 人。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于树德、谭平山等是孙中山指定的代表 林伯渠、罗迈、李维汉、夏曦、毛泽东、宣中华、韩麟符、王尽美等是由各省推选的代表，共产党员约占代表总数的 11%。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身份担任主席 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 5 人组成主席团 值日主持会议。共产党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起了重要作用。李大钊兼任了国民党宣言、章程、宣传三个审查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任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 谭平山任党务审查委员会委员 于树德任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 参加了大会的各项组织领导工作。

大会第一天 由孙中山致开会词和作《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的报告。他开门见山地说：“此次改组 就是从今天起 重新做过”就如古人所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 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又语重心长地指出 会期很短 所以会上“不可以无意识的问题 来挑拨意见”从前国民党之所以不能巩固 不是敌人来打破“完全是自己破坏自己”是由于“思想见识过于幼稚 常生出无谓的误解”。但孙中山的这一番忠告，国民党内有些人却听不进去。当大会讨论国民党章程时 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麟针对共产党员“跨党”指控“党内有党”指出党章应明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这项提案的实质是要取消国共合作。他的意见得到黄季陆、江伟藩等代表的支持，但遭到多数代表的反对。

李大钊当场发言 并散发《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 既严肃又诚恳地指出 若想完成国民革命事业 非有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不可“我们加入本党是几经研究再四审慎而始加入的 不是糊里糊涂混进来的 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

所贡献吾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因而是光明正大的，何况‘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李大钊说：那种对共产党人的猜疑防备“，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碍，断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李大钊肝胆相照的发言，赢得了许多真诚的国民党人的支持，“会场情形几乎顿时逆转”。廖仲恺继而发言说：共产党人加入本党“是本党一个新生命”，不是来拖累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的功夫的”。他明确提出：“对于方君之提案，表示反对！”大会否决了方瑞麟的提案，通过了新的党章。

大会最主要的成果，是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个宣言是孙中山委托鲍罗廷起草的，由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重新解释，使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革命内容。关于民族主义，过去只赋予反对满族统治的内容，现在认为民族主义的意义一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免除帝国主义侵略，二是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国内各民族自决权。关于民权主义，过去以西方代议政治为模式，信奉“天赋人权”，现在指出国家权力为一般平民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之，又进而规定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不得享有，从而抛弃了“天赋人权”思想。关于民生主义，基本上纠正了过去“少女般天真”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空想，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原则。“一大”后又紧接着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由此，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紧密结合，成为三民主义发展新阶段的标志。新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和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一致，所以孙中山

说“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好朋友”。

国民党“一大”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张国焘、韩麟符、沈定一、于方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占总数的近 1/4。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谭平山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林伯渠任农民部长。随后，中共党员夏曦、于方舟、韩麟书、刘芬、张曙时、沈定一、韩麟符、赵干等被分别派遣为湖南、直隶、山西、湖北、江苏、浙江、热河、江西等省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筹备员，分赴各地建立国民党组织。国民党“一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国民党已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统一战线组织。

创建革命军队的工作也开始了。苏俄革命的成功经验使孙中山认识到“为什么俄国遭了那样大的艰难，遇了那样多的敌人，还能够在 6 年之内，把所有的障碍一概打消”，取得革命的彻底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革命军做革命党的后援”。孙中山决心“创造革命军”，“挽救中国的危亡”。孙中山的想法得到苏俄政府有力的支持。鲍罗廷在到达广州之初，就向孙中山介绍了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孙中山兴奋地说：“这是我们所没有的，我们也必须完全这样做。”

1923 年 10 月开始，国民党中央开始研究“组织国民党志愿师和创建军事学校”诸问题。12 月，国民党中央根据孙中山的提议，正式决定建立国民军军官学校。国民党“一大”后，建校工作迅速展开。1924 年 1 月 24 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但蒋介石对国共合作正在满腹狐疑中，因而弃职不干，去了上海。军校的筹备工作主要由廖仲恺和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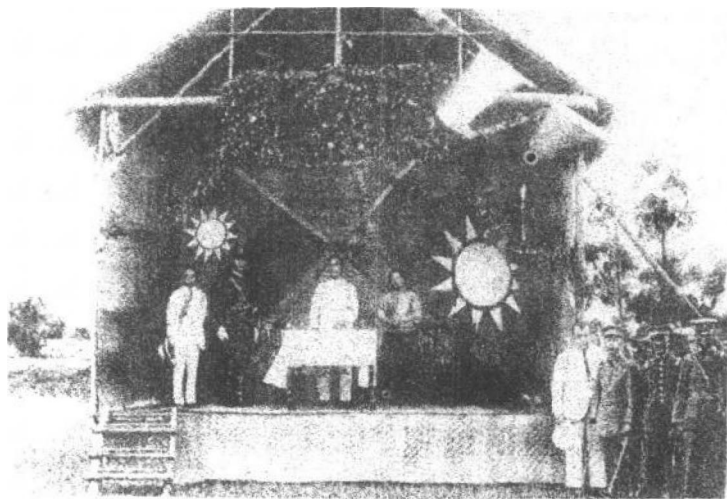
罗廷负责。月底，以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为组长，由捷列沙托夫、捷尔曼、波良克为成员的军事顾问小组应邀参加筹备工作。

5月5日黄埔军校正式成立。6月16日孙中山亲临黄埔出席开学典礼，并发表长篇演说，指出“要利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 成立革命军”重新创造革命事业，号召军校学生“牺牲一切权利，专心去救国”成为“革命军的骨干”担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重回广州的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由总理、校长、党代表组成校本部，为军校最高领导机关，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校本部下设政治部、教授部、教练部、管理部、军需部和军医部，后又增设教育长、军法处和参谋处。军校借鉴苏联红军的经验，建立了中国军队史上前所未有的党代表制度，规定军校的一切命令、法规，必须由党代表副署方为有效。并把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摆在同样重要的地位，对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这些做法对于保证国民党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防止军队成为个人专断的工具起了重要作用。

黄埔军校是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结晶。军校初创之时，武器奇缺，资金困难，苏联政府及时派船运送步枪 8000 支，并资助资金 200 万卢布给军校，以解燃眉之急。随后，又运送大批军械到广州，支援革命军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大批军事顾问陆续到校工作，如贝斯查斯特洛夫（炮兵顾问）、吉列夫（军需顾问）、德喇特温（交通顾问）、卡拉绰夫（政治顾问）、沃里金（代首席顾问）、普里贝列夫（步兵顾问）、瓦林（工兵顾问）、罗加觉夫（政治顾问）、阿赫蔑多夫（卫生顾问）、阿利（交际顾问）以及加伦将军等，他们帮助制订教学计

划，修订各科教程，以当时苏联最新的军事理论和技术，进行讲授、示范和训练。中国共产党则抽调优秀的党员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熊雄、安体诚、张秋人、高语罕等到军校任职任教。军校政治部基本上由共产党人主持，军校的政治工作制度也由共产党人所一手创建。北京、上海、长沙、济南、武汉、广东、四川等地的中共党组织还选派了大批党团员和工农积极分子投考黄埔军校，保证了军校学生的良好素质。

黄埔军校办了 5 期后，国民党中央决定将它与各军的军官学校、滇军干部学校、湘军讲武堂、粤军讲习所、桂军军官学校等合并，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直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领导。随着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又先后在潮州、南宁、长沙、



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主席台上为孙中山
(右二)、宋庆龄(右一)、蒋介石(左二)、林仲钱(左一)